

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

吴心伯

【内容提要】 在后冷战时代,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发展,中美关系经历了重新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结构性层面,即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二是功能性层面,即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和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和挑战。这两个层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迥异。从发展趋势看,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取向将推动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中美两国沿着全球化这一主轴的互动将促使崛起中的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展现新的大国关系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 中美关系;国际化;结构性;功能性

【作者简介】 吴心伯,1966年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9)08 - 0021 - 09

就国际关系而言,两国关系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议程的国际化,二是影响的国际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在议程上主要关注的是两国间的交往、合作与分歧,很少涉及国际性问题(有些会涉及有限的地区性问题),它们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双边层面,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几乎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某些大国间的关系则不然,其议程不仅包括了两国间的议题,也包括了大量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议题,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有时甚至主要地)体现在国际层面,这些双边关系的走向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国际化了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一对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双边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第一次国际化之旅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它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20余

年的敌对,也开启了国际战略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时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影响到中国、美国以及苏联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影响到三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因此而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中美关系第二次国际化进程始于后冷战时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中美互动主要在双边和有限的地区层面上进行。在一些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分析家看来,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国际意义大大下降了。然而,在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

* 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位匿名评审者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与新格局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O6W038)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 359.

国力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意义和影响逐渐超越双边范围,向地区和国际层面延伸,由此开始了两国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这一次的国际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结构性层面,即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二是功能性层面,即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和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和挑战。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国际化的两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分析逻辑:结构性层面呼应着现实主义思维,即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重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带来的两国对于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竞争不可避免,两国之间因此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功能性层面则印证着自由主义思维,即为了应对由于全球化等带来的共同挑战,中美两国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责任,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本文旨在探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分析结构性层面和功能性层面的国际化对双边关系的不同影响,展望中美关系国际化的长远走向。

一 结构性层面与现实主义视角

中国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演变的重大发展之一,它不可避免地対现存国际体系的力量分布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改变着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是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力量优势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势必带来直接影响,而美国政治精英对这一影响(潜在的和现实的)也最为敏感。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反应构成了中美关系新的内涵。这样,由于中国的力量上升,中美关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双边层面,也影响到地区和国际格局,这就是中美关系国际化的结构性层面。这里所说的结构性层面包含两方面:一是国家间力量的分布状态,二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看待国家间关系,它注重力量对比及其演变,关注地区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强调国家间关系的零和性质,追求相对收益。这种视角所看到的国家间关系更多

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冲突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思维。

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中国力量的快速上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冷战后上台的第一届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一开始仍然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以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战略家们试图从大国兴衰和均势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影响。奈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兴衰的时期往往是国际体系出现巨大不稳定的时期。正如修昔底德在2500年前所写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同样,崛起的法兰西是19世纪欧洲动荡的原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因之一则是德国的崛起在其欧洲邻国中所引起的恐惧。奈认为,今天东亚的力量结构也以大国的兴衰为标志:苏联衰落并瓦解了,俄罗斯为内部问题所困扰,日本的力量在继续增长,中国则已开始改变它的经济。中国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最近的增长率得以保持的话,它将在世纪之交后不久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军事力量也会自然地增长。”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也强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以西发生的地缘战略变化,其重要性不亚于东边的俄罗斯探索一项冷战后的新安全概念。”受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21世纪初执政的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一开始也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2001年9月,小布什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美]汉斯·J. 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6、76~77页;[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34页;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1~12、16~17页;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1995, p. 91.

[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等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这里强调了亚洲均势(实际上是指对美有利的力量对比)的重要性,隐晦地界定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的身份。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使布什政府内的现实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感到不安。

对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是否必然会导致美国对华实施均势战略甚至遏制战略呢?似乎也不尽然。美国对华战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际格局的状态——单极、两极或多极。客观上,一个两极或多极的世界更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样的世界中,由于力量的分布状态具有分散性,任何一个现存的大国都不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会急剧削弱现有大国的地位。对现有大国来说,它们更关心的是新兴大国的战略取向,即它们将与谁联合,与谁对抗,因为这种战略取向有可能改变现存的力量对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最后20年的中美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大国的兴起,美国政治精英开始意识到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正如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等人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热情地谈到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它的主要的战略思想家们相信,世界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多极世界将比两极冷战世界更稳定,美国拥有一些特别的属性使之能在多极的环境中取得成功。这样的眼光为日本、中国和西欧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扮演更大的角色留下了充足的空间。”1971年,尼克松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由于经济力量将成为其他力量的关键因素,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20世纪最后1/3的时间里在其他方面的前途。事实上,这种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认识是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因素。尼克松在回顾他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的经过时表示,当初促使他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之一就是:“国际的环境已经变成一个多极的环境;现在也是使我们的外交活动进入多极的时候了。”对国际格局发展的多极化观点的认同和与中国一起牵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使得从尼克松到里根的历届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力量增长持积极态度。卡特总统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宣布:一个对世界事务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里根政府的国务卿黑格将军在1981年访华时表示:“我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安全和繁荣对于全球的平衡具有根本的意义。”

单极世界则不然。在单极世界中,现存大国垄断了力量优势,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则不可避免地要削弱这一优势,因此现存大国最为敏感的就是新兴大国力量的增长。有研究显示,“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虽然其信奉的政治哲学和外交理念有所不同,但都以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为目标。克林顿政府在执政后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冷战可能终结了,但海外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要仍像以往那样强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加重要”。1999年初,克林顿在展望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要使世界免遭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灾难,就必须有一个领导,但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繁荣,更具有信心,也因此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入主白宫后,全面奉行“优势战略”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它复活了1992年“防务规划指南”中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eptember 30, 2001, p. 4.

Charles E. Morrison, *East As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2001, p. 51.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79页。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第100页。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第160、232页。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94, “Preface”, pp. II, 1.

符泉生:《从克林顿旧金山讲话看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3月18日电。

的战略思维,在谋求美国的力量优势的同时,密切关注和防止其他大国力量的上升,以强化单极世界秩序。正如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那样,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坚定地维护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根本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不允许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大国联盟谋求霸权”。

由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存在着“一超多强”的基本特征,美国政治精英或将此视为世界已是“单极”的证据,或看做是塑造“单极世界”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无论他们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是十分警惕的,其应对方式都带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特征。克林顿政府早在1994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中国力量发展的担心:“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具规模的军事实力,不让中国在安全方面对这一地区构成威胁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克林顿政府调整了美日同盟,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联系,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以提升对华安全防范和威慑,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政策取向。虽然克林顿政府总体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对华接触政策,但其对华安全政策的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小布什政府基于建立和巩固单极世界的理念,因而对中国的崛起尤为关切。2006年布什政府发表的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具有强烈的防范色彩,“吓阻”中国与美国开展军事竞争、应付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阻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是其对华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地缘政治和力量优势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布什政府的对华安全战略中表露无遗。

由此看来,由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一超”地位和美国政策精英对单极世界的钟情,美国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对中国崛起所做出的反应凸显了现实主

义的基本命题,即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在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争夺国际体系支配地位的冲突,这成为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是与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特征密切联系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中美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国际体系内在的逻辑和矛盾”。中美关系在结构性层面的国际化孕育着紧张、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并呼应着“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论观点。

二 功能性层面与自由主义视角

如果说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存在的话,那么特征之二就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正是后者调节和淡化了前者对国际政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使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呈现出新的方向和特征。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跨国问题的激增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凸显,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非法移民、毒品走私、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和挑战具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其性质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地缘政治的或均势政治的,它牵涉的不是传统的政治与军事这些高级政治议题,而是对某个问题领域的功能性治理问题。其次,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全面性和整体关联性要求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单个国家无能为力。“在这些

1992年,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在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主持下制定了《防务规划指南》,提出美国在冷战后首要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再次出现一个新的对手”,为此,美国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主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 49.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94, p. 24.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p. 29.

吴心伯:《试析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第7~22页。

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53页。

功能性领域中,民族国家无法依靠单边手段解决问题并取得满意的效果。因此,各国对实现合作产生了兴趣,希望通过合作为共同面临的问题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由于各国在应对这些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合作的偏好,全球化也因此改变了传统国际政治的竞争性质,并为思考国际关系提供了功能性视角。功能性视角的特点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重视合作中的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合作是个体战略的不断调适,合作过程中并不排除纷争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功能性合作以国际组织为形式的国际制度和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性视角带有自由主义的特征。

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为他们审视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克林顿政府1994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欢呼冷战终结的同时,又指出了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暴力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种族与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退化、人口剧增和难民潮等。1998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标志着克林顿政府开始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挑战。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越来越受境外事件的影响。美国处在一个变动不居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威胁与挑战。“无法无天”的国家和种族冲突威胁着世界上许多重要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以及有组织犯罪是跨越边界的全球性问题,其他曾经看来是相当遥远的问题如资源枯竭、人口剧增、环境破坏、新的传染性疾病和不受控制的难民迁徙等都对美国的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共同性。对中美两国来说,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以应付传统安全挑战为基础的双边关系框架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后,这些新的安全挑战开辟了中美合作的新领域,成为推动两国合作的新动力。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美期间与美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界定了两国在国际层面的合作领域: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

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基于对新的国际环境下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中美两国领导人愿意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丰富了后冷战时代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了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新框架的构建。

小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的安全观由于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突出重视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也因之成为美国的重点防范对象。但九一一事件使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关切,而建立广泛的反恐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也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大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看法。在2001年10月的中国之行中,小布什表示要和中国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002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着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时机,努力建设一个大国在和平环境中竞争而不是不断扩充军备的世界。今天,世界大国认识到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

王丽娟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247页;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第139页。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51页。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132~133页;关于全球性问题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的关联性,参见[美]卡伦·明斯特著,潘忠岐译:《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304页。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94, p. 1.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October 1998, p. 1.

《江泽民布什上海握手》,载《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0月20日第1版。

混乱的危险而同心协力”。关于中美关系,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将在与中国有相同利益的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稳定、防止艾滋病的蔓延、环境保护等。美国将谋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到了第二任期,小布什政府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其安全观也更具有时代性。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增加了一章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关注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指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改变了过去的挑战影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环境破坏等都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正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日益深化的认识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的积极的思维。它首先体现在时任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于2005年9月发表的《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中。佐利克尖锐地指出了中美合作的必要性:“请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基于对美中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认识,佐利克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思路:鼓励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道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从担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到鼓励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思维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变化是向克林顿政府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对华政策思维的回归。

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这两个重要大国的有效合作来处理全球化时代的各种共同挑战。首先,这一新的思路首先大大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扩大了中美两国的合作面。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第三次访华,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双方确认了中美在联合国改革、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解决地区热点、打击恐

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范自然灾害、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意愿。其次,这一新的视角也使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上升抱有更加务实和积极的看法。布什总统在2006年4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为之做出贡献的中国兴起。2006年8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The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全球兴起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不必视之为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确提出了挑战,但也提供了机会。通过维持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力量并建设性地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战略,我们正积极促使中国认识到,支持和加强国际体系符合其本身利益。我认为中国正日益认识到这方面的利益,我们在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

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中美力量对比客观上呈现彼强我弱的局面,美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上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外交的能动性增强,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外交理念上,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突出和平、重视合作、追求共赢”。在外交实践上,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不当头,不搞对抗,与此同时,积极寻求和扩大与他国的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中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2002, “Preface”.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2006, p. 47.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Remarks before the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3,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m/69899.htm>.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9页。

国外交的新姿态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一些美国学者将这些积极变化称为“中国的新外交”。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小布什执政初期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不利条件下,避免了两国关系的重大倒退。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和朝鲜核问题再度突现后,中国及时表现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并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作用,这一系列积极举措推动着布什政府对华看法的转变——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到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看做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从而使中美关系的合作面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企业积极在海外拓展市场、寻找资源、扩大投资,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大大增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与日益活跃的中国外交相结合,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可见度”,使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赋予中美关系以全球意义。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全球意义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或均势政治的,而是带有全球治理的鲜明印记。

从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看,2005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中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全球性的合作伙伴,能够随着国力的增强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表明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认识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开始重新从国际层面思考中美关系的内涵,以构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2005年9月,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由此成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华政策的关键词之一。在实践层面,中美在2005年启动了两个重要的对话机制。首先是“中美全球事务论坛”,2005年4月,该论坛首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旨在加强中美两国在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上的合

作,并探索就全球事务展开合作的新途径。其次是“中美战略对话”,2005年8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进行了首轮“中美战略对话”。建立该对话机制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在智利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高层定期对话。它不仅关注双边关系,还聚焦地区和国际问题。在中美战略对话框架下设有若干具体事务磋商机制,定期就政策规划以及对中东、非洲、亚洲和拉美事务进行磋商。柯庆生在评价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时表示:“与过去几十年的双边交流不同,我们与中国的对话远远不限于探讨如何管理两国的双边关系。两国间的对话越来越着重于美国和中国如何更好地合作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这正是中美关系在功能性层面国际化的具体体现。

中美关系在功能性层面的国际化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美国呼吁中国与其合作解决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机遇。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了世界,中国的利益也远远超出了国界。正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是新形势下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体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的需要。美国从正面看待中国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5, 2003, pp. 22 - 35.

《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2006年4月21日,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hjtc200604/tz47613.htm>.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March 19, 2005,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m/2005/43655.htm>.

美方称之为“中美高层对话”。

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China's Global Choices through Diplomacy," Statement before the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March 18, 2008, <http://www.state.gov/p/eap/rls/m/2008/03/102327.htm>.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在世界事务中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有助于降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新兴大国与既存霸权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和对抗的风险。其次,它有助于开拓中美关系新的发展空间、弱化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作为现存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总有人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削弱其国际地位,这是传统的零和思维在作祟。如果从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视角看问题,中美零和式的竞争就会转化成双赢的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在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既是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更有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当新兴大国与既存霸权的关系眼看就要在传统政治空间陷入“山重水复”的困境时,全球化将这对关系带入了“柳暗花明”的境界。

三 中美关系国际化的走向

迄今为止,中美关系所经历的两次国际化的进程是不一样的。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层面上,其影响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其理论印记是现实主义的。21世纪初的国际化呈现出两枝化(bifurcation)现象:既有体系结构层面的,又有功能性层面的,其影响既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又有全球治理上的,其理论印记兼具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今后中美关系国际化的进程将如何演变?两个层面将如何此消彼长?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趋势将弱化结构性层面的张力。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国际体系单极化特征明显、单极化趋势甚至有加强之势的话,在第二个十年里,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由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所遭遇的挫折与危机,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这已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精英所认识到。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发表的《2025年的全球趋势》坦承,“在今后的15~20年里,对于国际制度的演变,美国将发挥比任何其他国际行为者更大的影响,但在一个多极世界上,它将拥有的力量要比数十年来所曾拥有的要小。由于其经济力量和较小程度上军事力量的相对下降,美国不再拥有从诸多政策方案中做出选择的灵活性。”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特曼

(Roger C. Altman)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从中期来看,美国的全球舞台将会缩小,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可能会加速崛起。”在此背景下,明智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将逐渐放弃单极世界的梦想,接受多极化的现实,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持更加包容的态度。正如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其他国家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它们会寻求更大的行动自由。这必然意味着美国说一不二的影響力将要削弱。但如果这个创造中的世界有更多的权力中心,那它们几乎都致力于秩序、稳定和进步。我们不应狭隘地执迷于我们自己的短期利益和利益集团,而首先应该把这些崛起的力量纳入全球体系,让它们反过来扩大并加深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简而言之,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体系的结构,从而有助于减少中美两国之间结构性张力,使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的权力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下降,使中美关系国际化的结构性层面变窄。

第二,全球化的发展将进一步拓展功能性层面。冷战结束后,大国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划线,而是出现了“中性”特征:既非敌又非友,既合作又竞争。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转型,主要表现为国家互动中合作与协调的一面的上升,国际制度的作用突出。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跨国问题的增多和相互依存的上升),都在不断提升中美合作的需要。这种功能性的合作与冷战时期基于地缘政治需要的合作不同。基于地缘政治需要的合作可能会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终结,但基于全球治理的合作则不然,由于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美之间的功能性合作将是长期的和持久的,它有助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November 2008, p. 93.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1, 2009, p. 14.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sweek*, Vol 151, No. 19, 2008, p. 27.

王丽娟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第37、39~41页;[日]星野昭吉、刘小林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第97~111页。

于抑制和降低中美两国相互对抗的冲动,推动美国决策者从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避免以零和思维看待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全球治理的基本思路是要进一步扩大和健全国际制度,以建立起一个协调国家间利益的框架体系”。数量上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广的国际制度不仅有利于促进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也有助于管理双边关系——规范和制约各自的行为、调节双方的分歧、缓和两国间的矛盾。这样,全球化的发展使中美关系越来越多地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展开,两国间的合作面扩大,双边关系的可管理性增强,从而不断拓展两国关系国际化的功能性层面。

第三,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取向也推动着中美关系功能性层面的发展,并有助于减少结构性层面的张力。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全球治理的必要。中国的安全观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对外政策越来越注重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治理,外交实践越来越多地借重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在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充分汲取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致力于探索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坚持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眼光和以建设性的姿态来处理中美关系,努力增加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减少和化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这些持之以恒的努力有助于塑造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正面印象,有助于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第四,从美国方面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早期表现为理想主义)始终是主导美国外交思想的两大流派,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也总是在二者之间波动,而美国国内政治版图的变动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导致这种政策波动的主要因素。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一般来说,共和党信奉现实主义,民主党推崇自由主义;共和党喜欢单干,民主党借重国际机制。但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这种党派偏好会因时因势而变。例如,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拥抱进攻现实主义,追求美国的绝对力量优势和主导地位,重视地缘政治因素,致力于阻

止其他大国的崛起,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维。然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凸显了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小布什政府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认识到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寻求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到了第二任期,小布什政府期盼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与美国一道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从而表现出向带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全球治理思维的转换。

当然,如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将继续交替影响美国外交思想一样,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将长期存在。一方面: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上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合作面的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担心,对美国实力优势和国际首要地位的关切,都使美国对华政策继续表现出显著的“防范”和“避险”特征。中美关系国际化的两枝化现象会继续存在。但总体上看,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些都有助于使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的最突出的趋势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它不仅改变着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美关系的结构和内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美两国沿着全球化这一主轴的互动将促使崛起中的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将摸索出一条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之道,从而打破“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论观点,展现新的历史逻辑。

[收稿日期:2009-01-19]

[修回日期:2009-06-03]

[责任编辑:谭秀英]

王丽娟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第260页。

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

Abstracts

Managing the Risks of Overseas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Diplomacy

Zhang Shuguang (6)

Informed by the existing debates on risk management of public interests, the author assumes: first, overseas interes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overseas national interests embody risks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scope in globalization era; third, risk management shall be applicable to both business practi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urth, the risks of overseas national interests can be managed through diplomacy; fifth, an integrated model of diplomatic management on the overseas risks shall be applied. With growing overseas interest as well as increasing risks,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isks effectively, China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involving strategic think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resources allocating, operational engineering, public discouraging, R&D exploring,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ng.

On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Su Changhe (13)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is defined as a type of national interests which entitled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istributed in extra-territorial areas within the established global linkages of domestic multi-actors. The encompassing overseas interests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for China to maintain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s in prot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terests. China has taken a unique way of realizing its overseas interests due to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domestic way of pressure resolution, and the peace-oriented political system.

The R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u Xinbo (21)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ave gone through a phase of re-internationalization o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levels which have produced very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ve tendenci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will push the in-

temationalization process towards a more functional direction. Globalization as the primary basis for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will truly make the rising power and the already existing big power real partners, creating a new logic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ace Studies: Intellectual Origins, Visions, and Approaches

Li Yingtiao and Lin Jing (30)

In recent years, feminist researches on peace have been on the increase in China.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eace is a kind of politics of hope, an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er be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bilities. Peace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in multi - dimensions, and through embracing the values of harmony, care, lov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cultural bridges are built,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s among peoples, states, and men and women are facilitated. They also emphasize on the value of " thinking socially, and acting personally. "

Care and Justice: The Ethical Pursuit of Feminist World Order

Su Yunting and Jin Jilong (38)

Which order to build? How to build? This is always the cor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Mainstream theory such as realism believe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world order can not be gained until we analyze behavior of states. From this point, there is no justice, or the justice order can be built but among democratic states. Feminism brought forward a different world order idea by introducing gender factor. Feminists believe justice between genders is the base of world justice. Justice comes from care, care is the higher moral pursue than justice.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are is the precondition of building a peaceful, harmonious and just world. To the reality of world politics after the Cold War, feminism not only is critical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future world order.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USA] David A. Lake (45)

With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created in the early 1970s, 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 a dominant approach, now structures and guides research among many scholars, at least in North America. The author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PE with its early currents of the field, and then explains the three analytical blocks of OEP, namely,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ntional bargaining. The author contrast OEP with constructivism, its most plausible approach. China 's rapid rise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ont only brings dramatic changes to world economy but also highlights two analytic limitations of OEP on interntional market power and in-